

唐代文學

論叢

總第九期

陝西人民出版社

唐代文學

論 叢

總第九輯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主办
西北大学中文系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 代 文 学 论 丛

总 第 九 辑

主办：中国唐代文学学会 西北大学中文系

编辑：唐代文学论丛编辑部 （西安西北大学中文系唐代文学研究室）

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刷：西航公司印刷所印刷

发行：陕西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插页：1 字数：258,000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198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900

统一书号：10094·681

定价：2.50 元

《唐代文学》论丛编辑委员会

主 编：景生泽

编辑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运熙 王启兴 卞孝萱 邓魁英

安 旗 朱金城 郁贤皓 景生泽

董乃斌 傅璇琮 阎 琦

目 录

○()
○()
○()
○()
○()
○()

唐诗新探

○()
○()
○()
○()
○()
○()

郑谷年谱.....赵昌平(229)

《捉季布传文》校补.....赵逵夫(272)

《唐才子传·李远传》笺证.....梁超然(287)

元稹裴淑结婚时间地点略考.....吴伟斌(296)

陋室和《陋室铭》考论.....苍 丁(305)

◎(研论)◎

(究)论岑参边塞诗的独创性成就.....何大江(317)

◎(生文)◎

松浦友久李白研究述评.....郁贤皓(340)

再论唐诗的吟咏.....华钟彦(362)

论唐代通俗诗的兴起 及其历史地位

张 锡 厚

在众星璀璨、千汇万状的唐代诗歌王国里，王梵志、寒山为代表的唐初通俗诗^①犹如异军突起，以它那新巧泼辣、通俗易懂的语言，自由沉郁、惊世骇俗的诗风，冲破唐初诗坛沿袭齐梁以来“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②的浮靡华艳的沉闷局面，初步摆脱那种利用诗歌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贵族文学倾向，打开了“直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③的创作道路。为唐代诗苑吹进清新活泼的民间气息，开创一个能够适应诗歌口语化、真实化要求的通俗诗派。尽管它同唐代诗歌的繁荣景象相比，尚显得稚拙粗糙，乃至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不过，在侈丽绮靡风气正盛的初唐诗坛，能够出现这种质朴浑厚的通俗诗派与之并行于世，也说明来自民间的通俗诗歌具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通俗化的历史进程。

但是，王梵志、寒山等人的通俗诗之所以产生在初唐，绝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而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学发展的条件下逐渐成熟起来的。为了探讨唐初通俗诗的历史地位并作出

客观的评价，有必要追溯一下它是怎样兴起的。

—

王梵志、寒山等为代表的唐初通俗诗是唐诗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它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开拓出口语俚词皆可入诗的通俗化道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唐元稹、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晚唐曹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现实主义诗篇的创作。使粗疏质朴的通俗诗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势不可当的文学运动，在同典丽浮靡正统诗歌的对抗过程中取得了越来越大的成就，充分说明诗歌通俗化是文学创作古朴质直诗风的自然延续。

诗歌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文学起源于劳动，最古老的创作莫过于鲁迅先生所说的“杭育杭育派”^④，它虽然幼稚得可笑，却是劳动者共同劳作的真实记录，这种原始文学是一看就懂的，毫无藻饰可言。当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出现以后，诗歌创作才被正式肯定下来，它以大朴不雕的语言，真实地抒写贵族的享乐生活和奴隶们的反抗心声。其中一些作品生动自然、简洁明快，如《诗经》开卷第一篇《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千百年来一直为人称道。《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觶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象这样一些明白如话的诗句，实为后代通俗诗之滥觞。春秋末期楚国出现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也是率意之作，寓意明达。可见，早期出现的通俗诗歌，目的

在于致用，讲究实际效果，就不可能写得晦涩玄奥，让谁也看不懂。

但是，随着社会的推移，人们的精神要求不断发生变化，反映到诗歌本身也有斗争，渐次出现藻饰，而藻饰一多便易于堆砌，慢慢走向只重形式、不计内容的极端，以致艰奥难懂，由诗而发展到汉赋。鲁迅先生说过：“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尸，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譬如《楚辞》罢，《离骚》虽有方言，倒不难懂，到了扬雄，就特地‘古奥’，令人莫名其妙，这就离断气不远矣。词、曲之始，也都文从字顺，并不艰难，到后来，可就实在难读了。”^⑤同样，诗歌的发展也是如此，经过一段沉寂后，建安时期是诗歌创作的高潮，文人争相竞作五言诗，篇章日富，究其风格远效汉代乐府民歌，产生许多反映“世积乱离，风衰俗怨”^⑥的篇什，它们不务雕镂，含不尽之意在于言外，还是容易读的。进入齐梁时代，讲究声律、铺陈排比之风，甚嚣尘上，使诗歌创作面临着“离断气不远”的困境。直到唐初，那种沿袭齐梁余风的浮靡华艳的创作空气，凭借着帝王势力还继续笼罩着诗坛，虞世南、上官仪以及沈佺期、宋之问竞相趋效，创作典雅富丽的宫廷诗，而“四声八病”说奠定的五、七言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⑦的表现形式，又推动格律诗的发展。与此同时，要求诗歌平易通俗的倾向也在不断增长，即使是宋之问本人，偶而也有清新明快之作，《渡汉江》云：“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这样的诗句已经蕴含着自然亲切、接近口语的成分。至于生活时代比宋之问更早一点的王绩，则创作出在诗歌风格上能够摆脱初唐绮靡浮艳气息的诗篇。他的

《过酒家》诗云：“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对酒但当饮，逢人莫强牵。倚垆便得睡，横瓮足堪眠。”这些遣词炼句浅显通俗的语言结构，已开王梵志通俗诗的先河。

王梵志通俗诗产生在初唐的原因之一，就是它能适应文学发展过程自由质朴与典丽侈靡的两种倾向斗争，直接承继古代诗歌创作贵在素朴质直的优良传统，体现出诗歌通俗化、口语化的民众要求，所以他的诗作才能在民间广泛流传，远及西部边陲的敦煌地区也保存着大量的手抄写本。

其次，唐代通俗诗的兴起同民间歌谣的陶冶和启迪，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远如《诗经》里民歌色彩较多的国风，已经开始吸收民间语言入诗，经过长时期的演进，汉代通俗体民歌民谣也在潜滋暗长。如汉高祖死后出现的带有民歌意味的《戚夫人歌》：“子为王，母为虏，终日春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⑧。汉成帝时《黄爵谣》：“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害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昔为人所羨，今为人所怜”^⑨。前者虽然杂有三言句，但已基本采用五言诗句直抒胸臆；后者则纯粹以五言叙写，讥刺时政，含义深刻，这是五言通俗诗的早期形式。此风一开，势不可遏，民歌民谣得到继续发展，如汉光武帝时《樊晔歌》、汉安帝时《崔瑗歌》，都已写得通俗流畅。而汉明帝时的《城中谣》更加明白如话：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⑩。

至于汉代音乐官署“乐府”采集的民间歌谣，更是以广泛使用简洁炼达的通俗诗句为主，对后代诗歌创作产生巨大的影响。《晋书·乐志》云：“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鸟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也”。这类源自民间，经过文人润色之后而保存下来的歌谣体诗篇，质直素朴，自然流畅，是当时社会历史和人民生活的真实记录，很容易流传下来，也可能引起诗人文士的兴趣，渐渐被吸收到他们的创作中去，进而推动诗歌沿着通俗化方向不断发展。“东晋到齐梁的《子夜歌》和《读曲歌》之类，唐朝的《竹枝词》和《柳枝词》之类，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因为没有记录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更少了。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往往倒吃惊，吸入自己的作品中，作为新的养料。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①。正是由于民间歌谣同文人创作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五言通俗诗才不致被扼杀，才不致被文人创作的典雅诗篇所淹没，才有可能作为诗歌发展上重要的文学现象得到不断充实提高。

魏晋以来，社会动荡，政治迫害加剧，崇尚玄谈之风日盛，诗人文士往往利用通俗的五言诗，以讽刺嘲谑的口吻轻议时政、寄托隐怀，表现出一种愤世嫉俗和劝世警俗的诗风。如曹植的《七步诗》，以“豆萁相煎”比喻兄弟骨肉相残，寓意深长，可算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五言通俗诗。再如应璩的《百一诗》，通俗易懂，多切时要，今世所传只有少数几首，就中仍不难看出对王梵志的家训、世训、佛戒等格言诗的影响。应璩诗云：“子弟可不慎，慎在选师友。师友必长（一作良）德，中才可进诱”。“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腴理早从事，安复劳箴

石？”“苟能娱耳目，快心乐腹肠。我躬不悦欢，安能虑死亡”^⑫。再看看王梵志某些类似道德箴言的通俗诗，就很容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似的格调，如王梵志诗云：

晤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若知管鲍志，还共不分金。（《王梵志诗校辑》卷四）

尊人慎约束，共语莫耽驿。纵有些些理，无烦说短长。（同前）

至于有人把王梵志的“道情诗”同郭璞的“游仙诗”并列为“跌宕格、骇俗品”，盛称为“外示惊俗之貌，内藏达人之度”^⑬，也显示出唐初通俗诗同汉魏六朝以来的通俗诗风，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不过，在诗歌发展过程中涌现的一些通俗诗，大都出语自然，率意成章，形式简朴，诗趣韵味不浓，自然不会引起封建阶级及其正统文学的重视，甚至有的还被长期摒弃在诗坛之外，失去了它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就不足为怪了。然而当我们看到唐代通俗诗始终沿着质直自然的文学道路，在同各种雕饰繁缛文风抗争中得到不断发展时，就会发现它的某些表现手法主要受民间歌谣的影响。

隋唐诗坛尽管陈袭六朝雕饰浮艳的文风，而流行民间的歌谣则仍以通俗的五言体为主，如隋大业间《长白山谣》：

长白山前知事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稍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死辽东，斩头何所伤^⑭。

又如隋炀帝时《挽船夫歌》：“我兄征辽东，饿死青山下。今我挽龙舟，又困隋堤道。方今天下饥，路粮无些小。前去三千程，此身安可保”^⑤。都以明白如话的诗句，直接反映隋代穷兵黩武、滥用民力，激起人民反抗的社会现实，既有深刻的内容，也比较注重艺术表现形式。说明隋唐之际来自民间土壤的诗歌愈来愈被用于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斗争，大胆抒发自己的不满和愤懑，从而为通俗诗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这也是唐代通俗诗能够逐渐兴起和广泛流传的关键所在。以王梵志为代表的唐初通俗诗派正是在民间歌谣日趋成熟的情势下发展起来的。

再次，隋唐以来那种以民歌民谣形式出现的通俗诗不仅盛行民间，由于封建阶级某种偏好的刺激，也往往可以登堂入室。那时候，一些皇公贵胄、达官文人偶而喜欢以戏谑嘲弄、隐喻讥刺的口吻，信口作出意味深长的通俗诗，即使是崇尚典丽的封建皇帝非但不加以制止，反而颇为赞赏这种活泼自由的诗风，上行下效，此风所及，也助长五言通俗诗的发展。如

《隋唐嘉话》卷中记载“唐太宗宴近臣，戏以嘲谑”的故事，长孙无忌嘲笑“为人瘦小特甚、寝陋”的欧阳询，诗云：“耸膊成山字，埋肩不出头。谁家麟阁上，画此一猕猴”。欧阳询不甘示弱，立时反唇相讥：“缩头连背暖，佞裆畏肚寒。只由心潏潏，所以面团团。”这两首接近口语的小诗，一直流传下来^⑥。又如唐太宗在长安崇胜寺召徐贤妃，久等不至，待要发作之际，忽然送来一首诗：“朝来临镜台，妆罢自徘徊。千金买一笑，一召讵能来”^⑦。这首诗利用自然乖巧的口语，狡黠地开脱慢君之罪，也颇耐寻味。相传唐高宗时，武后生四子，长子弘立为太子，武后图谋朝政，药死弘而立次子贤，贤

每每忧惕，作歌辞令乐工歌之：“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这就是著名的《黄台瓜辞》^⑧，实际上也是一首讽意深沉的五言通俗诗。

唐初社会的封建秩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诗歌随时有可能被用来粉饰“太平景象”，成为宫廷贵族生活必不可少的点缀品和消遣品；但是，那种借用民间诗歌的语言体式彼此调笑，寻寻开心，排遣无聊烦闷的时光，也是常见的文学现象。唐中宗时，有人居然借用通俗诗句嘲笑“皇帝怕老婆”。孟棻《本事诗》云：

韦庶人颇袭武后之风轨，中宗渐畏之。内宴唱《回波词》，有优人词曰：“回波尔时桺桺，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韦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赐之。

象这种运用通俗诗句调侃戏谑的作法，不但未遭非议，反而得到上层社会的偏爱，朝野之间难免形成一种风气，吸引着更多的诗人文士尝试创作谐谑讽喻的通俗诗，同时也刺激它向更加诙谐含蓄的方向发展。如隋代监察御史孔绍安，投奔唐室的时间略迟于夏侯端，未能得到厚遇，在侍宴时写下《咏石榴》一诗抒写他内心的隐衷：“可惜庭中树，移根作汉臣。只为时来晚，开花不及春”^⑨。唐初的李义府也曾向皇帝进诗：“日里扬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许多树，不惜一枝棲。”结果博得唐太宗的欢心：“朕以全树借汝”^⑩。

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因作嘲讽的通俗诗而讨个没趣

的。唐中宗神龙年间，薛令之感于东宫冷落，难以上进，写出一首发牢骚的诗：“明月夜团团，照见先生盘。盘中何所有？苜蓿长阑干。饭涩匙难绾，羹稀箸易宽。只可谋朝夕，那能度岁寒？”这里把讽刺的矛头指向封建帝王，当然难为所容，得到的结果依然是通俗诗式的逐客令：“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无奈何只得谢病归家^④。事实表明，唐初封建统治阶层虽然只在窄狭范围内使用民间诗歌隐喻讽刺的艺术手法，有时也吸收通俗语言入诗。但是，由于他们的偏好和赏鉴，却使诗歌的创作逐渐发生由典丽趋向平淡、由空虚回到现实的转变，进一步推动诗歌通俗化的历史进程。因此，通俗体诗歌既能得到上层社会的偏爱，流传在民间的通俗诗势必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

最后，唐初通俗诗的兴起同宗教也有一定的关系。“诗歌起源于劳动和宗教”^⑤，这已为一般文学史现象所证明，而译经和讲经等宗教文学的繁盛，又对通俗诗的发展产生有力的影响。佛教自东汉永平年间传入我国，“佛学东流，适未尤著，始自洛京，盛于江左”^⑥。魏晋南北朝时，佛学得到广泛传播，据《魏书·释老志》卷一一四所载，“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院三万有余。”随着佛学的大量输入和传布，诗歌中侈谈佛理禅机、追求诗歌通俗化的倾向逐渐时髦起来，因此，佛学盛行时期产生的诗僧和通俗诗歌也相对的高涨起来。远如四世纪的帛道猷在《与竺道壹书》云：“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因有诗曰：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次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闻走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人。”表现出佛教徒也可以同诗人一样优游山水，触兴而发，自由抒

写性灵。到五世纪的惠休，六世纪的宝月，已经创作出更多具有世俗味的诗歌。

但是，因为佛寺禅门的戒律甚多，释氏僧徒除了诵读研磨佛讚偈颂等宗教文字，不大可能纵情于歌咏情性、优游山水之间。然而佛法教规的禁遏，不但没能产生阻止释氏僧徒作诗兴趣的效果，反而使他们沿着诙谐嘲弄、劝世警俗的方向发展，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通俗诗风。如《高僧传》卷十一记载益州怪和尚邵硕（死于四七三年），说他“居无定所，恍惚如狂”，“为人好韵语”，“因事立谑，协议劝善”，可惜他的通俗劝善诗没有流传下来。还有另一种情况，有的寺僧不满足佛门的空虚渺茫，作起离经叛道的讽刺诗来，如《续高僧传》卷三五记载唐初明解和尚，于龙朔年间应试及第，趁还俗之机赋诗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归？”居然利用通俗诗句攻击佛门教义。这些怪和尚的言行及其诗作当然会给后代释徒包括王梵志、寒山等以一定的影响，从而把释氏诗歌创作逐渐由佛寺禅门的虚幻境界，引到抒写现实人生的真情实感中来。

那么，释氏僧徒的诗作为什么比文人创作更具有口语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呢？如所周知，佛教能否得到广泛传播，能否取得善男信女的奉仰，其佛经教义又能否深入人心，主要依靠译经和讲经要具有通俗易懂的语言，如早期译经人安世高翻译的佛经“义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④，这种浅明平易的译经语言给宗教文学提供良好的榜样。其后鸠摩罗什等人译经为了进一步达到不加藻饰、浅近明白的目的，往往运用通俗口语、散韵合体的文字翻译佛经，逐步实现口语化、韵文化，特别是颂讚铭偈又多采用四言、五言、七言的通俗语句，自会加速梵歌向通俗诗方向的发展。另一方面，唱

导、讲经的兴起也推动宗教文字的口语化，如敦煌写本保存下来的佛陀变文、讲经文已显示出这种通俗化的倾向。唯其如此，佛经典籍才能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才能适应民间大众的需要，同时，依靠佛教的尊严抬高通俗语言的社会地位，从而影响到文学创作。这样一来，佛寺禅门便有可能成为语体文和通俗诗的重要传播地，在时代风气启迪下，王梵志、寒山为代表的通俗诗派涌现那么多涉及佛理经义的五言诗也是很自然的现象。

综上所述，唐代通俗诗是民间诗歌的主要表现形式，它直接继承古代诗歌素朴质直的优良文学传统，在民间歌谣逐步影响到诗人文士的诗歌通俗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封建阶级和上层人士偏爱的有利条件下，才有可能得到发展和流传，而佛寺禅门日益广泛地使用接近口语的韵文沟通和密切同世俗社会的联系，以及梵歌同俗歌的相互接近，又为五言通俗诗开辟一条讥刺嘲讽、劝世警俗的新途径。王梵志、寒山等人正是生当唐代前期儒释道三教盛行之际，徘徊于世俗社会与佛国世界的民间诗人，很容易接受传统的诗歌通俗化历史潮流的影响，大胆吸取和借鉴民间歌谣的表现手法，积极运用佛寺禅门梵歌语言口语化的成就，使五言通俗诗这种文体渐趋成熟起来，以致形成唐初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一定的历史贡献。

二

唐代诗人王梵志、寒山等创作的五言通俗诗，除了同传统的诗歌通俗化倾向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外，在表现形式和创作方法上也有着新的尝试和大胆创造。然而，王梵志及其诗作自宋代以后却长期失传，甚至被摒除在唐代诗人之外（如《全唐